

帝国魅影中的英语文学

张春晖,叶汝惠^①

(保山学院 英语系,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帝国的魅影在文学中依然如影随形。从17世纪肇始,发展到今天作为文学创作一脉的“帝国魅影投射下的英语文学”已经几度沧桑。以帝国兴衰和演变脉络为坐标,对英语文学中的帝国牵连进行系统梳理,把握其状貌和走向,是文学中的“帝国”研究的基点。

[关键词] 帝国; 英语文学; 演变脉络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5-0127-06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帝国”成为一个日益显赫的话题,关于“文学中的帝国牵连”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无论是宗主国作家的帝国想象及对帝国兴衰和走向的关照,还是殖民地作家对帝国的“反书写”和权力话语之外的平等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这个前提下,以帝国兴衰和演变的历史脉络为坐标,对英语文学中的帝国牵连进行系统梳理,把握其状貌和走向,是文学中的“帝国”研究的基点。

上篇:帝国建构的书写

“帝国”自何时开始对英语文学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文学史家仍各持一词,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自17世纪伊始,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对帝国建构的想象叙事。培根在《新工具》第1卷中盛赞为人类提升国家地位付出的劳动以及劳动对改变人类生存境遇的攸关作用。受当时横扫欧洲智识界“发现新大洲”的风气的驱策,在其随笔《论种植园》中,培根极力主张对“新世界”进行按部就班的开发和理性的规划。比如,通过派遣精通种植业的专业人士和采取卓有成效的拓荒措施,适时而稳步地推进海外疆土的建设。此外,《论种植园》论及建立种植园的时间表以及如何管辖土著居民和派送大量本国女性来增加殖民地殖民宗主国人口的问题。在另一篇随笔《论帝国》中,培根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该文系统论证了通过殖民战争(尤其是和当时的最大殖民对手西班牙开战)来拓展殖民地的

逻辑依据。科幻小说《新大洲》成为“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的培根人文理想的最佳注解。一群被暴风吹离了行程的水手在南太平洋岛屿中建立了一个富裕的王国,这正是培根理想中藉由人的力量构建的乌托邦王国^[1]。

另一位差不多和培根处于同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则预见到帝国统治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众多的纠缠和纷争。《暴风雨》的主人公普洛斯彼罗崇尚科学,凭着过人的智慧他巧妙地夺取了新世界里的某个岛屿,但他疲于应付原岛主的儿子凯列班。对普罗斯彼罗侵吞家国、囚禁自己亲人的暴行,凯列班始终怀着刻骨的仇恨,经常以激烈的反抗来发泄这种仇恨。他学会了仇敌的语言,也学会了用这种语言来控诉:“你教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益处只是知道怎么骂人;愿血瘟病瘟死你,因为你要教我说你的话。”^{[2]362}另一方面,殖民者清楚他必需利用殖民者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如普洛斯彼罗对女儿米兰达所说:“我们缺不了他:他给我们生火,给我们捡柴,也为我们做有用的工作。”^{[2]311}但是,随着对被统治者了解的深入,统治者越来越感觉如坐针毡,片刻不得安宁。普罗斯彼斯变得喜怒无常,米兰达则以对她强奸未遂的凯列班恨之入骨。显然,殖民过程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灵魂都饱受煎熬,这种充满着紧张的对抗统治将是成问题的。

内战时期的英国放缓了对外拓展进度。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17世纪末,随着政局的稳定和大量贸易公司的复兴,殖民扩展再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

[收稿日期] 2013-06-12

[作者简介] 张春晖(1972-),男,云南凤庆人,保山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①保山学院艺术系讲师。

的主旋律,看似前途无量的殖民前景再次激发了许多作家的创作欲望,这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小说里。

阿弗拉·本的《皇家奴隶》引发了英语文学界对新的殖民机遇带来的骚动和焦虑进行关注的热潮。小说以作者曾经生活的荷兰殖民地苏里南为背景,记述了殖民者武力侵占所招致的创伤和阵痛。一方面,苏里南资源丰富,宗主国利用殖民者的劳动进行开发;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片充斥着暴力、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土地。小说结尾,我们看到血腥的“国王被肢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一幕成了殖民征服初期的典型表征。

大不列颠王国的帝国建构对18世纪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发展的推波助澜,在丹尼尔·迪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上得到更进一步体现。凭着理性、探索精神和勇气,鲁滨逊在荒岛上解决了生存的问题,成功地生存了下来,他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中人类改造、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最佳典范。在小说的续篇中,鲁滨逊成为一片富庶的种植园—殖民地的统治者,这里居住的罪犯、被驯服的加勒比奴隶、食人土著以及道德上“重生和回归”的白人都为他们的统治者鲁滨逊服务。作为杰出的种植园主、自身版图的勇敢守护者、日趋增多的“臣民”的“仁慈”的主人,鲁滨逊实际上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和英帝国早期的殖民代理人。从他对原住民体现出的侵略性、自我为中心、嗜血残忍、贪婪和明显的种族优越感,以及从他幻想大肆屠杀土著居民和臣服、压迫“星期五”父子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对鲁滨逊的人格进行解读:在理性、奋发图强和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背后,是狂想症、权利欲望、独裁而暴戾多疑的一面。所有这些,使得鲁滨逊成为帝国主义/殖民者原型的写照。同时期的作家一方面鼓吹拓展和殖民,另一方面则断断续续和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邪恶信仰和罪恶感,或者介于两者间有意或无意的含糊其辞,这成为早期帝国小说的最明显的表述症候。

如果说迪福等作家的作品对帝国殖民语焉不详和大张旗鼓进行颂扬兼而有之的话,另一位出生于爱尔兰并终生和祖国人民血脉相连的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则充满尖刻而辛辣的嘲讽,对帝国殖民的先遣分子(比如南太平洋公司)武力侵占异域并血腥镇压原住民的海盗行径和罪恶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和义愤。斯威夫特抨击为帝国殖民扩张出谋划策并成为帝国喉舌的迪福之流,揶揄由皇家协会授权并打着种种“科学探索”旗号的海外远征和商业探险。爱尔兰背景赋予了斯威夫特其他英国作

家不具备的独到洞察力和远见,他敏锐地预见到科学技术将被滥用于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镇压,而投机资本将导致这些民族的生存境况日趋恶化。在《布商的信》、《一个谦虚的建议》和《格里夫游记》里,无论是对殖民意识的嘲弄,还是对殖民行径的戏仿,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国色彩。另一位爱尔兰籍作家奥利弗·戈尔德斯密斯的小册子《对目前知识状态的追问》(1759)对殖民主义作了入木三分的批评,诗作《旅行者》(1764)则把英国人刻画成刚愎自用、自我至上的民族。相同背景的理查德·谢里丹的剧作《匹扎罗》在对殖民者厚颜无耻和不择手段表现出惊愕、失望之余,流露出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显然,爱尔兰出身背景赋予了18世纪一些作家一种全新的帝国书写视角。18世纪末出现的反帝国话语,还有谢里丹的演说和剧作,埃德蒙德·伯克向议会提交的一系列报告,这些作品主要谴责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殖民掠夺。

次要的作品,比如亚历山大·蒲柏的《温莎森林》和《卷发历险记》,反映了英帝国醉心于全球贸易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介入海外事务。此外,詹姆斯·汤姆逊在1744年版的《季节》杂志中流露出对一下子展现在眼前的海外处女地的惊诧和新奇感以及对唾手可得的新殖民地的垂涎。

18世纪末的大不列颠惊觉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国人对此的反应多是肯定的、积极的。一些作家开始到殖民地定居,并书写当地生活。一些天真的作家忘记了殖民地潜在的危险,开始尝试和当地人展开交流和合作。威廉·戴尔力姆普(William Dalrymple)在其《白色要人》(2002)中评论,只需看看早期定居在印度的英国人的书信和回忆录,就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从1770年到1830年这段时间,伴随着双方大规模的文化同化,这些英国人正被以一种空前复杂的方式卷入到由民族情绪、偏见、歧视交织成的关系网络中^{[3]98}。到18世纪为止,书写帝国的传统已经植根于游记、回忆录、日志、历史传记和小说等文体,其中某些作品体现出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由东印度公司掌控的印度帝国的理念。亚力克·博姆在《书写印度》中指出,这些作品的主题,从英帝国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自信叙述”到“焦虑和不安全感”都有所涉及^{[4]45}。

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基于帝国领属地稳步拓展体验的作品,兼有文学和历史文献价值。典型的例子是埃兹拉·菲的《来自印度的书信集》,该作记述了女作者勇敢的印度之行,尤其是她在加尔各答逗留期间赚钱谋生的经历。E·M·福斯特对该作特

别青睐,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品,并盛赞作者杰出的“活力”和“卓越风格”^[5]。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之眼》一书中指出,该作的原创性在于体现了殖民者与文化他者短兵相接时的“接触区域”,即生活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人面对当地人时的复杂况味^{[6]126}。而且,作者以独到的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方方面面,深切地意识到置身于印度—英国语境下的女性性别的脆弱性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关系的微妙性和复杂性。普拉特指出,种族压迫、不平等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有关殖民地游记的书写主题^{[6]47}。

英语文学中大量涌现基于殖民地体验的作品的同时,一些印度作家也开始书写他们对帝国中心腹地大不列颠的印象。先是周游爱尔兰后来定居英国的塞克·迪恩·默罕默德发表了《迪恩·默罕默德游记》(1794),这部旅游见闻录成为公认的第一部南亚作家的英语作品。不久之后,另一位同样周游英国的作家拉加·拉莫汗·罗伊也开始用英语创作和发表印度19世纪初宗教和社会改革方面的随笔。这个时期主要的印度诗人麦考尔·杜特和小说家昌德拉·查特吉起初都尝试用英语进行创作,但最终都转向用孟加拉母语创作,因为他们认为母语更适合创作。起初用殖民者语言创作的作品数量不多,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如托鲁·杜特(Toru Dutt)的诗作和司娃密·费弗卡南达的小说富于灵感和智慧,但他们的作品最终没有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充分关注。这个时候,作为英帝国殖民馈赠的南亚英语文学,还没有在文学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

赛义德·爱德华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集中讨论了19世纪上半叶经典英国文学作品里的帝国指涉。他指出,尽管这个时期的作品诸如《曼斯菲尔德》、《远大前程》并没有谈及英帝国在西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的帝国统治,但在这些作品的次文本里,帝国的影子无处不在。这些殖民地是“作为一种指涉、一个定义点、早期想象中旅游、财富和提供服务的场所”^{[7]35-37}在作品里出现的。与此同时,英帝国对与殖民地的跨文化交流表现出鄙夷和厌恶态度,认为东西方文化异质而不同流,很难交融贯通。有的西方极端精英分子甚至认为,西方五十年的积淀就足以超越中国一个文化纪元的发展。在《白色要人》中威廉·戴尔力姆普注意到,原先错综复杂的观念、衣着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在维多利亚时期很快被放弃了,因为到这个时期,宗主国认为已经成功地在意识形态方面牢牢地控制了被统治者^{[3]23}。

到19世纪中叶为止,英国本土作家对海外帝国

的书写流露出的主流态度是积极乐观的,这反映了国民对帝国前途日益增强的自信心。南亚、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是国民心目中被帝国以正当而合法的方式进行收编的地方,这种理念体现在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中被上升为一种信仰,即控制进而使这些地方文明化,是上帝赋予大不列颠的使命。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国民对帝国建构抱有不可遏止的热忱。帝国事业的成功让国民生出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并相信大不列颠按照自身需求来调整和重构世界格局已为时不远了。

中篇:挑战与创痕

1857年在印度爆发的被称为“印度的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印度民族起义”让大不列颠的自信和帝国伦理遭遇了挑战和重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被历史学家称为“高度帝国主义”的时期。亚力克·博姆在《帝国书写》前言里论述道,伴随着维多利亚时期种种强制的种族分化努力,一方面政变后的帝国文化产品体现出“扩张主义的、充满自信和自觉的帝国意识”,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流露出一种被反殖民意识所消弭、转化的焦虑、自信缺失、不安全感 and 不确定感的趋向^{[4]49}。伴随着殖民地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大英帝国被弄得焦头烂额,尤其到19世纪末印度本土抵制帝国殖民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英语文学中的帝国书写的基调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原先埃兹拉·菲作品里所见的乐观主义和世纪中叶作品里把殖民地视为攫取财富和行使“文明使命”的场所的那种自鸣得意消退了,被代之以世纪末吉卜林等作家作品里所体现出的不安全感。

吉卜林早期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充满着1885年国大党成立带来的紧张和压抑感——这为所有英籍印度人所熟悉,吉卜林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一旦民主和自由在这块土地上实现,继之而来的自治将意味着帝国的终结,也意味着以往的好日子将一去不返。他的《朱特斯的奇异之旅》在国大党第一届大会召开时出版,这部小说生动地记述了“印度民族起义”留在英国人心中日复一日梦魇般的痛楚,反映出印度出现自由和民主的曙光时,英籍印度人对何去何从的担忧和恐惧。《朱特斯的奇异之旅》开启了英语文学帝国的另一阶段,一个聚焦于帝国内部权力被重新划分的阶段。此时的“接触区域”成为激烈冲突的场所,充斥着公开的抗议、示威游行和更为隐秘的政治交涉中的不和谐和对抗。对企图进行民主改革的部分英国人和“篡位夺权”的印度人

的满腹牢骚和抱怨,都明显地体现在吉卜林这一时期的小说、诗歌和速记里。

即便在《基姆》这样显得相对温和的作品里,读者仍不难觉察,“民族起义”打乱了小说的叙事平衡。基于对帝国统治的合法信念和一个英籍印度人对生于斯而长于斯的土地的真挚情感,整部作品笼罩在一片对帝国的怀旧情绪中,但作品里的某些插曲扰乱了整部作品不温不火的喜剧基调。比如作者对帝国忠心耿耿的效忠者,哈里·巴布不无揶揄。巴布对主子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亦步亦趋,但无力消化而表现出几分鹦鹉学舌的笨拙和滑稽。他酒醉后一番“不体面而严重叛国”的爆发表达了其内心的失衡:他埋怨政府强制自己接受英式教育,却没有给他提供和白人一样的待遇。

事实上,20世纪初帝国的海外卷入让具有几分洞察力的英国人深感不安和悲观,失察的一部分人虽然保持着一贯的乐观和自信,内心深处潜伏的焦躁越来越显得欲盖弥彰而呼之欲出。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纷至沓来的动乱报道使得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纷纷踏上了“灵魂求索之旅”。在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里,忧心忡忡的马洛回顾了他在刚果的创伤体验,对帝国的海外卷入及后果深感困惑、忧虑和痛楚。类似的描述也出现在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里。这些作品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帝国对越来越难驾驭的被统治者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她已明显地嗅出被殖民者强烈的民族情绪,明白被统治者对外族强加的桎梏已经失去耐心。奥威尔另一部作品《杀象》追忆了一位涉世不深的年轻警官如何在殖民地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主人公在缅甸射杀一头大象的事件成为帝国主义本性的隐喻——出于对他者的恐惧而往往诉诸不经意的暴力行径。贝妮塔·芭利在《后殖民研究:一种唯物主义的批评》里指出,这个时期英语文学中的印度文本和帝国的自我表征都明显偏移了原先的方向,显得无所适从^[8]。

如火如荼的反殖民斗争成为令统治者焦灼的源头,对南亚作家却意味着自由和希望。英语创作成为他们控诉殖民暴行和言说独立诉求的工具。值得注意的作品有甘地的《论印度自治》(1919)、泰戈尔的《民族主义》(1916)和诸如“自由的精神”等的政论、尼赫鲁的《自传》(1936)和《发现印度》(1945),当然还有上述作者和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演说。最终赢得持续国际声誉的是20世纪上半页那些在海外成功发行的作品,如罗宾德拉南·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阿南德·库马拉司娃密关于印度和斯里兰

卡文艺的著述——所有这些,成为帝国的“反话语”,昭示着一种自由和新生的话语方式的勃兴。

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得印度英语文学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帝国纠缠使得英语成为印度作家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对未来寄望的媒介。对此作出贡献的主要作家有P·K·纳拉扬、拉加·劳、M·R·阿南德和阿哈姆德·阿里等南亚英语小说先驱。值得注意的是,纳拉扬、拉加·劳和阿南德的小说还反映出印度独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内形势,也反映出出于变革期间各种思潮的酝酿、交汇和萌芽。觉醒的印度全方位接纳了甘地的思想,不但要摆脱殖民统治,也要同几千年来坚如磐石的旧思想、旧体制和旧传统彻底决裂。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透过欧洲人的眼光来打量和解读非欧洲人,藉由英帝国的书写来了解印度,比如吉卜林的《基姆》、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以及保罗·斯科特的《滞留》(又译《眷恋》)。18、19世纪的西方学者、作家始终抱着帝国本位的立场来解读东方,在吉卜林等帝国狂热分子的激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即将所谓的“他们”(They)表现成“我们”(Us)的反面,由此长期积累了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的帝国思维。

1835年,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宣布在印度推广英语,目的是培育一小批精通英语的精英,引导着这个国家的潮流和方向,实现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出乎意料的是,英语在印度生根发芽并促进了作为印度文学重要分支的印度英语文学的生长和荣兴。新兴印度英语作家没有西方人那种习惯性眼光,他们熟悉印度、热爱印度并真切地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在他们笔下,这里的社会面貌、风土和古朴美好的人性被彰显,一个真实的印度被还原出来。他们再现现实的物质基础是本土的,在主题建构上也力求突显本土意义和地位。殖民者的语言成为殖民地人民重新自我审视、自我认同和自我申述的工具,这大概是起初自信的殖民者始料未及的。

下篇:后殖民时代的两种言说

尽管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1947年告终,非洲各国也在50年代纷纷独立,殖民对独立后的宗主国和被殖民国家的影响和后遗症是深远的。后殖民时代的英语文学一如既往地书写着这些影响和后遗症。英国作家J·G·法雷尔的《克里希纳布尔之围》(1972)回顾了让帝国殖民理念遭到第一次重创的“印度民族起义”,似在有意揶揄,以这段帝国历

史进程中的“大事件”对帝国生涯做一番清算再合适不过了。保罗·斯科特的《拉吉四重奏》(1966-1975)追溯了帝国由萌生到消亡的历史,他的另一部小说《继续逗留》(1977)则再现了独立后逗留在印度的英国人的复杂心态。斯科特等作家的小说系列及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反映了英国国民对失落帝国的怀旧情绪。

对帝国往昔辉煌的眷恋和惆怅,也见诸大众文学领域里,比如约翰·马斯特斯的《孟加拉的夜奔者》和《宝华尼车站》。在《想象中的家园》(1991)里,拉什迪对这种怀旧情结进行了辛辣的评论。拉什迪认为,这些梦想“帝国复兴”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进行了歪曲地、程式化的,也不无偏见的再现,因而有意无意地为帝国主义的道德、文化、艺术和种族至上论进行辩解和翻案^{[9]43}。同时,拉什迪指出,帝国的纠葛远未结束,很多作家正不遗余力地为逐渐黯淡的帝国形象添光抹色。形如“被肢解的四肢的抽搐”的帝国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和“帝国复兴”小说的兴起,就是明证^{[9]89}。对此萨义德也有类似的评论,英国的“帝国复兴”思潮和美国同时期咄咄逼人的新帝国主义有着内在关联,两个国家的文化产业都以或同或异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宣扬帝国意识,这是后殖民时代的特征之一^{[7]59}。

印度独立六十多年以来,英语书写已然超越其他本土书写而成为印度书写的代表和主流。在千帆竞发的印度文学生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英语作家的异军突起。在奈保尔等大批本土作家的作品里,英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时至今日,印度英语作家中有拉什迪和奈保尔这样声冠东西的大作家,也有先后斩获英语文学界的桂冠布克奖的阿兰达蒂·洛伊(1997)和基兰·德赛(2006)、阿拉文德·阿迪加(2011)等这样的后起之秀——英语文学创作已然成为印度文学版图中最令人夺目的图景。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流散”作家的代表拉什迪,从其作品中大致可以窥见后殖民时代印度英语作家和作品关乎帝国牵连的概貌。作为生活在西方的南亚流散作家代表,其作品题材涉及移民群落独特体验:孤独感、被疏离感、流亡感、对故国的思念、从同族聚居到被异族同化的心态变异,等等。一方面,拉什迪犀利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陷阱,即独立后外族专制被国内专制代替的危险。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拉什迪等作家身体力行的“逆写帝国”成为解构殖民主义表达、重构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文类。拉什迪最终成为“逆写帝国”风

格的集大成者,其作品以独创性和不竭的活力成功地再现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南亚移民群体的命运。其力作《午夜的孩子》(1981)和《撒旦诗篇》(1989)雄辩地证明了麦考尔·葛勒在“帝国之后:斯科特、奈保尔和拉什迪”一文中所标版的“语言多元主义”的可行性^[10]。

此外,其作品对伦敦和孟买的描写揭示出无论在宗主国还是在南亚或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原先的“身份”问题被打乱而变得错综复杂,没有一方能对帝国带来的多元、杂糅保持熟视无睹而一成不变,冲突、进而重叠和多元是大势所趋。最后,穿梭于不同的时空和地域,拉什迪代表着一群突破地域界限、四海为家的新生代后殖民作家的兴起。跨越着两种文化,背负着异化感和失落感,“离散”是这些作家的宿命,也是他们作品的永恒主题。基兰·德赛2006年获布克奖的小说《继承的遗失》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再现了帝国实践留在新旧两代人身上的创伤和阴影。

更多作家则承袭了阿南德和纳拉扬等前辈铺就的传统,深深植根于印度本土。在他们的作品里,本土的人物和主题代替了帝国中心的人物和主题,聚焦于贫穷、阶级偏见、种姓压迫和父权及男权等社会问题,关注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在印度性、家园意识和现代性方面与西方霸权话语进行协商和对话,强调政治、文化的独立,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者的断言,而且是自我中心性和自我决定性的建构和彰显。政治诉求方面而言,在解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帝国文化/民族文化的抗争洪流中,这些作家是不屈不挠的中坚分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文学价值方面的考量而言,印度英语作家及其作品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首先,独到的价值选择和伦理选择,反映出他们创作思想的独到之处;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再现方式、对文学作为人文表征与文明理想的关系、文学作为政治表征的解构和建构作用的不懈探讨,则体现出其独到的创作观;边缘的文化身份,加之置身于现代性转型和后现代文化席卷的双重语境,生存境遇、东方/西方冲突、传统/现代冲突、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霸权主义的抗衡和超越等,都籍这些作家文笔得以凝定和升华。因此,其作品的主题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异质特色;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生活方式,在创作中转化为独到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体现在独特的叙事结构、叙事声音、语言、话语等表达形态里,形成其独特艺术和审美品格。

结语

从 17 世纪发轫,到 18、19 世纪的发展乃至 20 世纪的分流,“帝国”投射下的英语文学已然汇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河流,伴随着惊涛异响,幻化为一道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无疑,文学中的“帝国魅影”尚未消退,仍将是很多作家不竭言说的主题。基兰·德赛和阿兰达蒂·罗伊等新生代作家的异军突起并融入文化全球化浪潮,这是帝国纠缠下的英语文学发展中的新趋向,也是新的里程碑。文学中的“帝国书写”感应、接纳着时代脉动,同时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人类精神生态圈开启着心窗,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文学的外围环境”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关系性、有机性和整体性。探讨帝国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态链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地审视其文学生态价值,是今后文学中的帝国研究应该着眼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 Bacon, Francis. *The Works*[M]. Ed. James Spedding et al. Vol. 4. London: Longmans, 1870:27,58,98.

- [2] [英]威廉·莎士比亚. 暴风雨[M]. 朱生豪,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 [3] Dalrymple William. *White Mughals: Love and Betrayal in Eighteenth-Century India*[M].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02.
- [4] Boehmer. Elleke. Introduction. *Empire Writing: An Anthology of Colonial Literature*[M]. 1870-1918. New York: Oxford UP, 1998.
- [5] Forster E M. Introduction; *Original Letters from India*[M]. 1925. By Eliza Fa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6:65.
- [6]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 London:Routledge, 1997.
- [7]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 [8] Perry Benita. *Postcolonialist Studies: A Materialist Critique*[M]. London: Routledge, 2002: 89.
- [9]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M]. London:Granta Books, 1991.
- [10] Gorra Michael. *After Empire: Scott, Naipaul, Rushdi*[M]. Chicago: Chicago UP, 1997:78.

English Literature Projected by Imperialism

ZHANG Chun-hui, YE Yu-hui

(*BaoShan College, BaoShan 678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shadow projected by the British imperialism has never ceased to haunt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aking the vicissitudes and evolvment a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aims to get a panoramic view of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ving trends.

Key words: Imperialism; English literature; evolutionary framework